毛泽东重庆谈判的故事

1945年10月8日，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庆谈判行将结束，毛泽东、周恩来正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大礼堂出席欢送晚宴，气氛热烈。晚宴后，张治中邀请毛泽东观看文艺演出晚8时许，演出进入高潮之际，一位身材魁梧、行色匆匆的中年男子步入剧场，向中共首席谈判代表周恩来附耳低声报告，下午6时许，办事处秘书李少石从沙坪坝回红岩村途中，遭遇枪杀，送市民医院抢救无效，不幸遇难。在如此敏感的时刻，发生这样的事件，使周恩来不觉一震！为了避免惊动毛泽东，周恩来立即沉着地离开会场，找到负责治安警卫的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向他提出严正质问和抗议。

李少石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女婿，他的形象儒雅，从侧面看上去，与周恩来颇有几分相似。这件事是否是针对周恩来策划的？有没有政治背景？它是否意味着国民党高层对国共关系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毛泽东是否能够顺利地离开重庆返回延安？这一系列的问号一下子涌上周恩来的心头。从重庆谈判开始以来，所有关心中国前途命运的人，无不对毛泽东的安危忧心忡忡。为了保障毛泽东的安全，周恩来和所有在重庆的同志都处于一种高度戒备的精神状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不敢有一丝一毫懈怠。李少石事件的发生，无疑将同志们的忧虑情绪推向了最高峰……

让我们把目光回溯到两个月以前。

1945年8月10日，日本即将投降的消息传到了重庆。经历14年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百年以来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举国上下奔走相告，普天同庆。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国内矛盾顿时凸显。中国人民普遍要求和平民主建国，这个愿景能否顺利实现？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一举一动，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在这个关键时刻，蒋介石先下手为强，作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8月14日，蒋介石给毛泽东发了第一份电报，称“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国民党《中央日报》也大造声势，在国内要闻版以大字标题刊出新闻“蒋主席电毛泽东，请克日来渝共商国是”，摆出要以谈判求和平的姿态，企图抢先占领舆论制高点和战略主动权。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毛泽东不温不火地回以“朱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我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朱德总司令电文提出的是受降程序未明的问题。

8月20日，蒋介石给毛泽东发了第二封电报，“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蒋介石的这封电报，蒙蔽了一些媒体，《大公报》社论的评价是：“蔼然诚坦，溢于言表，不须我们多作解释。我们相信全国同胞的

心情，都与蒋主席相同，殷切盼望毛先生不吝此一行，以定国家之大计。”《纽约时报》发表社论声称“中国共产党不愿参加合作”。《中央日报》总主笔陶希圣说：“我们明知共产党不会来渝谈判，我们要假戏真做，制造空气。”

8月23日，蒋介石第三次发电，继续坚持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蒋介石这三封电报，将中国共产党推向了风口浪尖，使其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蒋介石摆下了一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鸿门宴。如果不去，蒋介石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把“不要和平、挑起内战”的罪名扣到共产党和毛泽东身上。去，无异于深入龙潭虎穴，毛泽东的安全如何保障？张学良被长期监禁，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李济深曾被软禁的遭遇，即是前车之鉴。

面对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势，中共中央政治局连日召开会议进行讨论。8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枣园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郑重表态：“我是否去重庆？还是出去出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

8月24日，毛泽东即回复蒋介石：“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同日，《新华日报》发表署名“莫一尘”的文章《解决问题的关键》，文章批评那种一定要毛泽东亲赴重庆的论调，认为“显然蓄着一个很大的阴谋”，并以政治犯遭关押、政党无合法地位和特务横行暗示毛泽东赴重庆不安全。

这件事如何决策，事关重大。一些解放区领导人向中共中央发电报，坚决反对毛泽东亲赴重庆。8月25日、26日，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会讨论这个问题。为了国内和平、民主、团结的实现，毛泽东毅然决定，接受蒋介石的邀请，深入虎穴！他认为“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城下之盟的可能，但签字之手在我”，“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同时毛泽东也作了最坏打算，如果作出最大让步还不行，就“准备坐班房”，“如果是软禁，那倒不怕，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

毛泽东的发言，一锤定音。中央政治局同时决定，由周恩来、王若飞陪同毛泽东前往重庆进行谈判。作为深谋远虑的战略家，毛泽东郑重地向中央建议，他离开延安期间，由刘少奇代理党中央主席职务；中共中央书记处增补陈云、彭真为候补书记，以便在毛泽东周恩来都不在的情况下，书记处还能正常运转，高效决策，指挥全党继续奋斗。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们十分清楚，作出这样的人事安排，无疑以防不测，确保党和人民的事业后继有人。大家的心里都沉甸甸的。

作了最坏的准备，还要争取最好的结果。对于毛泽东在重庆的安全警卫工作，中央政治局委托周恩来考虑具体方案。经过反复研究，周恩来指定龙飞虎、颜太龙、陈龙等三人做毛泽东的贴身警卫员。龙飞虎和颜太龙都是井冈山时期的老红军，抗战爆发后，先后跟随周恩来赴重庆，政治上绝对可靠，熟悉重庆情况，长期从事保卫工作，是最佳警卫人选。

随后，周恩来又召集会议，专门研究毛泽东在重庆的警卫工作，决定增派毛泽东的警卫班战士齐吉树照料生活，另派枪法精准的警卫员舒光才、戚继恕等随行。同时，周恩来决定，曾家岩 50 号周公馆的保卫，由武全奎负责安排；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保卫，由办事处处长钱之光负责；谈判期间代表团对外办公地点的保卫，由朱友学负责。

一切俱已安排妥当。临行前，毛泽东与刘少奇彻夜长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正式向全党公布了毛泽东亲自去重庆谈判的决定。

中央的决定公布后，基层的同志对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是什么看法？著名作家方纪在散文《挥手之间》中，为我们留下了详细的记述：“八月二十七日，延安飞机场天上飞来一架美国飞机，那是美国特使赫尔利和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张治中将军来了。来做什么？‘还不是缓兵之计！’人们私下这样议论。当天夜里，党支部忽然传达了中央关于和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思想上说什么也转不过弯来，何况是毛主席要亲自去重庆！当时心里像压上一块石头，点着一把火，又沉重又焦急，通夜不能入睡……有不少老同志感情深重地说：自从上了井冈山，毛主席就没有离开过我们一步，五次反‘围剿’，万里长征抗日战争，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军队和自己的根据地。如今，却要亲自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

8月28日，是毛泽东启程的日子。延安数千军民到机场相送，气氛十分凝重。登机后，“主席的面容出现在飞机窗口，人们又一次拥上去，拼命地挥手。主席把手放在机窗玻璃上。直到飞机转了弯，奔上跑道，升到空中，在头顶上盘旋，向南飞去，人们还是仰着头目光越过宝塔山上的塔顶，望着南方的天空，久久不肯离去。”

8月28日下午3时36分，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毛泽东、周恩来一行乘坐的476650号军用飞机在重庆九龙坡机场安然着陆。头戴灰色拿破仑帽、身着中山装的毛泽东第一个走出机舱，并向在场的人们挥手致意。山城重庆再次沸腾了！这是一件轰动国内外的大事使许多人真正认清了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的真诚愿望，受到舆论的热烈赞誉。诗人柳亚子赋诗，称颂毛泽东的这一行动是“弥天大勇”。

重庆谈判十分艰难曲折。历经40多天的艰苦谈判，国共双方基本达成协议，准备签署《双十协定》。但是，就在协议签署的前两天，就在为毛泽东举行欢送宴会的时刻，突然发生了李少石事件。在这个微妙而敏感的时刻，这不能不引起共产党方面的高度警觉。周恩来得到报告后，立即起身离开晚会现场，当面质问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这究竟是不是有计划的暗杀”，要求他立即彻查此事，并切实保证毛泽东的安全。

随后，周恩来赶到重庆市民医院，慰问李少石家属。在医院里见到李少石的遗体，周恩来想起了李的岳父廖仲恺先生，不禁悲从中来：“二十年前廖仲恺先生遭反革命暗害，其情景犹历历在目，不料二十年后，他的爱婿又遭凶杀。”现场笼罩在悲愤之中。

但是，为了确保毛泽东的安全，周恩来不能久留。他抑制住自己的悲愤，初步安排了李少石的后事，又匆匆赶回宴会现场。他要求宪兵司令张镇，必须用自己的汽车亲自护送

毛泽东。于是，张镇按照周恩来的要求，亲自布置了一次最高级别的警卫行动，深夜 11 点多把毛泽东安全送回红岩村驻地。

李少石遇难的消息传出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不安和震动。第二天上午，宋庆龄、邵力子、沈钧儒、陈铭枢、郭沫若、茅盾等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纷纷前往医院吊唁。重庆各报记者和在渝外籍记者 10 多人，也先后去医院探视采访，使这一事件迅速传遍了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

10 月 9 日，案情基本查清，国共双方确认，这是一次交通事故引发的偶然事件，没有复杂政治背景。

10 月 11 日下午，毛泽东安全返回延安。当他乘坐的飞机在延安机场平稳降落时，早就等候在机场的两万多延安军民，拼命鼓掌，热烈欢呼，迎接领袖的胜利归来！

从近些年新发现的史料来看，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的心情真是波澜起伏，他的确曾经考虑过趁谈判之机扣押毛泽东的方案。在 1945 年 9 月 27 日的日记中，他写道：“如此罪大恶极之祸首……如不加审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军民在天之灵耶？”经过反复权衡掂量，直到 10 月 6 日他才放弃了这个打算。这些新披露的史料再次证明，当年党内外的同志和朋友担心毛泽东安全问题，绝不是杞人忧天。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曾经询问老朋友章士钊对时局的看法，章士钊沉吟良久，在毛泽东手心里轻轻地写了八个字：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更有许多素不相识的具有正义感的中国人，默默地关心着毛泽东。比如，在国民政府行政院工作的钱剑夫，听说毛泽东在桂园会客的间隙，喜欢走出大门，在警戒范围之外散步。他敏锐地意识到，国民党内部各派对重庆谈判的态度并不一致，在重庆复杂的政治环境下，这十分危险，他立刻请朋友带给毛泽东一张字条：“晨风加厉，白露为霜；伏莽堪虞，为国珍重。”毛泽东看到字条后立刻会意，再未轻易走出桂园大门。点点滴滴，可见人心向背。

重庆谈判是人民力量的一次胜利。国民党当局表示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同意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广泛会见各界知名人士，开展多层次的统战工作，展现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风采，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人心。

（资料来源：《重庆日报》，2019 年 10 月 24 日）